

# 伊斯兰经堂教育与回族社会

回族教育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在回族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无论何种形式的回族教育,都与回族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成为回族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标志之一。自回族先民来华至新中国成立前,回族教育的形成如白寿彝教授所言,经历了“包含传统的家庭教育,手工业的师徒传授、经堂教育、新式学校教育”<sup>①</sup>等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对回族教育从总体上一般认为“是指培养回族人才的社会活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回族教育,泛指一切增进回族知识、技能、体质以及形成或改变人们思想意识的活动。包括传统的家庭教育、幼儿教育、社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女子教育、经堂教育、新式学校教育(普通教育)等形式;内容上,涉及道德品质、科学知识、宗教礼仪、民族风俗、劳动技能、特种工艺、医药医术等方面。狭义的回族教育,则单指学校教育,即通过学校对回族学生的身心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以便将其培养成为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服务的人的活动;基本上可分为宗教教育和普通教育<sup>②</sup>。而作为回族传统教育主要形式的经堂教育,自明代以后,对回族社会的影响长达400年之久,至今在回族社会的民间教育中仍呈现出其适应回族社会的活力和生命力。因此,可以这样认为,经堂教育是历史的产物,但在回族社会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是对回族教育所产生的巨大作用,早已超越时空,深深扎根在回族社会存在、发展的土壤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探讨经堂教育并不完全是为了审视回族教育发展之路的途径。

回族教育最早是从宗教教育开始的,早在回回民族形成之前的唐宋时期,回族的先民们——从阿拉伯、波斯等国来华的穆斯林蕃客就在他们留居中国组成的家庭中的一种自发的、原始的穆斯林宗教家庭教育。这种教育形式没有组织性和系统性,完全是每个家庭和个人所为,实际上是家庭长辈向晚辈灌输伊斯兰教基本知识的方式。其教育内容主要是教会子女们按伊斯兰教规定,进行沐浴、礼拜、斋戒以及饮食的禁忌等等,这种教育是适应当时在中国的回族先民社会的。回族的先民们来自不同的国度和地区,相互间也存在着语言上的差异,而且人数很少,分散在各地,彼此也没有经常的必然的联系。在一个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中国,这些西来的回族先民们为了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民族特征,只能通过家庭宗教教育的形式教育后代,使自己能够在中国生存和延续,并一代代保持固有的伊斯兰文化传统。到了明代中期,随着回族在中华大地上的壮大和发展,回族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堂教育取代沿袭了唐、宋、元三朝的家庭宗教教育;逐渐成为回族教育的主要形式。经堂教育是指在清真寺里,由开学阿訇招收穆斯林子弟,学习伊斯兰经典,传授伊斯兰教义、教法等基本的宗教知识,培养宗教接班人和穆斯林专门人才的特殊教育制度。有的观点认为,经堂教育是阿拉伯中世纪宗教教育移植于中国,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伊斯兰教传人中国并在扎根发展过程中逐渐中国化的结果。有些权威辞书中给经堂教育下的定义是:“中国伊斯兰教招收穆斯林青少年在清真寺内学经的宗教教育制度。”<sup>③</sup>经堂教育是16世纪在回族中首先创设的,其创始人一般公认是陕西渭南回族胡登洲(1522—1597年)。清代人赵灿所著《经学系传谱》中记载胡登洲“自幼聪敏绝人,灵慧逾众,且家业丰裕,富甲乡井,而生平无矜骄,不二色,及慕本教经书,欲译国语,以为斯土万世法。后客都门,年及半百,崇延名师,谙习诗书,由是过目成诵焉。不期年而能吟咏,适遭西来异人,相觅与语,遂出经指

授之。先生默识旨义,顿会其意,继归秦中,遍索藏经之家,高价迳售,积久虽(遂)多,于是昼夜钻研,刻苦考察,冬不炉火,夏不扇,夜不安于衽席者数年,乃深明正心诚意之学,贯通尽性穷理之源,宣天房之秘,漏泄其微,按东土之音配合其节,究于理之赅而不偏,辞之平而有味,且好学不厌,诲人不倦,于是远近吾道之正人端士,如梦者方觉,较于畴昔多有起色,自迹及遐寰中名播,吴、楚、燕、齐之彦,负笈载道,接踵其门而求学焉。”<sup>④</sup>胡登洲之后,经堂教育在他的两个嫡传弟子(西安回族人冯氏和海东阳)及再传弟子的积极传播下,推行于我国大部分回族地区,陕西是全国经堂教育的中心。

经堂教育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教育制度。清真寺是推行经堂教育的重要场所,全国各地的清真寺多附设有经堂教育的学堂,这种传统保持至今。经堂教育的老师均由清真寺负责聘请,或者由开学阿訇担任,一切教学费用也由清真寺开支。各地的经堂学校,一般分为大学、中学和小学三种。赵振武在《三十年来中国回教文化概况》一文中写道:“所谓寺的教育者,有大学,造就阿衡(訇)之学府也;有中学,中年失学者之受教处也;有小学,儿童之教育机关也。凡此,皆以请经为课,率读阿拉伯文、经课之外,概非所习。”<sup>⑤</sup>其中小学和中学比较普遍,大学则主要分布在穆斯林比较集中、经堂教育发达的城镇。如清同治年间以前,长安为经堂教育大学的集中地,各地阿訇多赴该地学习。同治年间之后,河州成为培养阿訇的重要地区。经堂小学主要是向回族儿童和少年进行伊斯兰教知识的启蒙教育,让他(她)们学会念“清真言”,学习穆斯林沐浴、礼拜、斋戒、信仰等宗教礼仪的常识,并学会简单的阿拉伯字母拼读。小学采取松散的管理办法,学童可自由地入学或退学;学习不分级别班次,随来随学;也无一定的学习年限,以学会基本的宗教常识为标准,一般是三至四年。中学的教育对象是从小没受过宗教教育的成年人,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古兰经)选读》(亥听),时间上无严格的规定,农村多在农闲时学习,城镇也多选择不影响正常工作、生活的时间进行。有的观点认为,在经堂教育中中学这个阶段的表现形式并不明显。大学里系统学习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语法、文法、修辞、教法、教义、《古兰经》经注、圣训等科目。大学里的优秀生,多被清真寺聘去讲经或任开学阿訇。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堂大学往往是培养阿訇的重要园地。

经堂教育所用的课本,在小学主要是:《亥听》(《(古兰经)选读》)、《择要注解杂学》、《古兰经》,在小学要求学会诵读和背诵有关章节。大学所用的课本,各地并不完全统一。民国以前,北方常用的经堂大学课本是:学习阿拉伯语法的有《艾萨苏·欧鲁姆》(亦称“连五本”,意为基础知识)五卷;《造伍·米苏巴哈》(意为拨亮的灯),是“连五本”的概括和总结;《舍拉哈·卡费业》(简称“满俩”),亦称《卡费业解》,意为语法大全补注)。修辞学方面主要教材是《台洛素素·米夫特哈》(亦称《白亚尼》),共三卷,分别讲阿拉伯语语言规律,各种修辞格的效果,论述语言与意义之间的修饰美化问题等。逻辑等方面的教材是《伊萨乌机》和《吾祖亦夫》两种。教法学方面的主要教材是《伟嘎业》(意为看守),原著为四卷,分别讲解从沐浴到五功的规定,婚姻、贸易关系和宰牲、社交原则等内容。

教义学方面的教材有:《凯俩目》(意为说辩),是讲授伊斯兰教认识论、宇宙论、认主与信主、人类与真主的关系、善恶报应等内容的认主学著作;《艾什尔图·米麻尔特》(即中文译本《昭元密诀》),是伊斯兰哲学中认主学方面的哲学著作。

经注学方面的教材有:《塔夫西尔·者俩来尼》(又称《加拉兰古兰经注》),是一本为《古兰经》作通俗注解的著作;《曼最》(亦称《曼最真经》),此书偏重于文法、章法结构;《候赛尼》,主要是从理学的角度对《古兰经》进行注解,理论性比较强。圣训的教材有:《虎图布》(中文译本称

《圣训详解》),是40段阿拉伯文圣训的波斯文注解书;《艾尔白欧》从偏重于理学的观点,是对40段圣训的注解书。文学方面的教材主要是波斯文的《古洛斯坦》(中文译本有两种:《真境花园》和《蔷薇园》),是用文字形式按伊斯兰教的思想,褒贬人间善恶,讽喻世态炎凉的作品。由于各地经堂教育的发展程度不同,在办学形式和使用的教材、课程设置等方面也呈多样化。但以清真寺为中心,弘扬伊斯兰宗教思想,在培养中、高级的宗教职业者等方面都是一致的。

经堂教育是中国回族教育史上影响最深远,延续时间最长的一种宗教教育的形式,至今仍然有其生命力。这种体制在内容上对阿拉伯的宗教教育内容有所取舍,并且增加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内容。在形式上它又采取了中国私塾教育的设置,并结合伊斯兰教的经济和宗教制度,建立了它的教学组织形式。因此,我们可以说:“经堂教育是中国伊斯兰的一种特殊的宗教教育体制。”<sup>⑥</sup>

经堂教育是回族社会发展,宗教信仰上出现衰微现象的产物,它的出现、形成和发展,对回族社会有着很大的历史作用。经堂教育产生的时期,正是回回民族自元末明初形成之后,回族社会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的时期。回族人口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已基本定型,经济生活中亦农亦商的特点也日趋明显。伊斯兰教作为这个民族唯一信奉的宗教,从各个方面影响着整个回族社会。语言上,早期回族的先民们来自不同的国度和地区,操各种母语的社会环境已不复存在,汉语已成为回族人共同使用的语言交际工具。与此同时,回族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口众多,分布广泛,又受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影响的回族,如何才能保持自己的民族特征和宗教信仰,加强宗教教育便成为回族社会摆脱这一困境的有效形式。而回族先民们原有的家庭宗教教育已不适应这种变化了的穆斯林社会。因为此时众多的回族家庭,亦非全由穆斯林组成,非穆斯林民族的成员不断通过婚姻等方式进入回族社会,而回族的家庭主要成员本身宗教观念也日益淡薄,无力教育下一代。加之明政府极力用儒家文化禁锢回族的头脑,歧视和限制伊斯兰教,更加剧了回族社会的信仰危机,出现了“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清静氏之言天堂,反不如释氏之言地狱”,甚至“虽其先宗教之家,今亦掉臂而叛去”<sup>⑦</sup>的状况。于是回族社会中上层人士根据他们所处的地位和所受教育即分成了两部分人:一种是政治上有一定地位或有希望通过读书入仕的人,他们或者为环境所迫,或者由地位和思想所定,以维护儒家思想为己任,对伊斯兰教信条多不遵守,并在公开场合隐瞒自己是穆斯林;另一种是笃信宗教的穆斯林,他们有意无意采取一系列回拒措施,阻止穆斯林接触汉语,接受儒家思想。……这种矛盾如果继续下去,就会从穆斯林内部瓦解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要存在下去,就必须找出制止矛盾

发展的办法。<sup>⑧</sup>经堂教育作为解决回族社会信仰危机和矛盾的措施之一,就以民间办学的方式应运而生。而且当时回族经济稳定发展,也为回族在清真寺内培养宗教接班人和传播者提供了比较稳固的经济基础。所以经堂教育的出现、发展与回族社会有着必然的联系,是适应回族社会发展中的变化和需要而产生的。

经堂教育与回族社会的密切关系是显而易见的。经堂教育促进了伊斯兰教在回族社会中的延续和传播,使明代以来伊斯兰教在中国社会的危机,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从回族少年儿童抓伊斯兰教基础教育,对成年人进行补习伊斯兰教知识,培养从事弘扬伊斯兰文化的职业教育者,这种阶梯式多层次的经堂教育,增强了伊斯兰教在回族社会中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维系了回族共同体的稳定存在。清代云南回族伊斯兰学者马致本谈到经堂教育对回族社会的作用时说:“我们的祖宗……遗留许多好规范、好事迹,其中最善的,就是他们在每个礼拜堂中……请一位伊玛目,一位开学阿訇,把他们儿童送进寺来学习教义规范……不致使他们生向隅之感。……倘使他们不立下这种好根基,那么伊斯兰在中国怎么会延续千多年直至而今呢?”<sup>⑨</sup>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堂教育确实在回族社会中起到了挽救伊斯兰教于衰微,复兴伊斯兰教文化在回族社会各个方面继续产生重大的影响和作用。经堂教育实际上已达到当初产生、兴办时所要达到的预期目的,也与回族社会在更深层次上的联系更为密切。

经堂教育为回族社会培养了一批宗教知识的传播者和通晓中、阿文的学者。在回族社会的基层单位——每个村子或城镇的教坊内,经堂教育培养的宗教职业者,成为回族社会各阶层受教育的讲授者和专门人才。经堂教育培养的高级人才,有些成为回族社会的宗教活动家和名师学者。“这些名师学者在中国最早讲授并研究了两种外语(即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引进了当时比较权威的伊斯兰教理论,从而使阿、波语的教学和伊斯兰教的某些观念、法规具有了中国的特色。个别的学者还对阿拉伯的天文、数学、地学知识发表了论述,有一批人又将中国的儒家伦理同伊斯兰教的同类教义进行了交融,为中阿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sup>⑩</sup>

经堂教育在回族社会中首开民间办学之先河,并延续到1949年。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历史传统又在回族社会中有恢复和发展。经堂教育是回族社会最基本的教育形式,它一出现,就与回族社会的实际需要和广大回族群众的自愿支持紧密相联系。经堂教育的校舍,多在群众集资兴建的清真寺内,聘请教师的经费,大都属于该清真寺的回族群众资助。学生们除接受资助外,家在农村的还自带口粮,并轮流为经堂师生们做饭。所用教材也是由群众捐资,民间印刷发行的。

(下转6版)

## “贝多”肝宁片 能让表面抗原转阴的新肝药

为什么“贝多”肝宁片赢得这么多肝病患者认可,为此,全国肝病防治协作委员会特别指出:

全面清除乙肝病毒并阻止其复制,让乙肝表面抗原全面转阴;提高人体免疫,阻止肝炎发展成肝硬化、肝癌的危险;修复并促进肝细胞再生;迅速消除食欲不振、恶心、乏力、尿黄、消瘦、脸色灰暗等症;纯中药制剂,安全无任何毒副作用,无耐药性,大人小孩均可服用等诸多优势而走进了肝病康复治疗的前列,为广大肝病患者带来了福音。



作为我国“虫毒治肝”代表药物,贝多“肝宁片”最大的特点就是:让肝炎表

面抗原全面转阴,也就意味着能彻底将病毒清除出体外,不再复发,是治疗肝病的最好结果,目前已成为肝病是否治愈的标准。

斑蝥是我国传统虫毒用药,贝多“肝宁片”选用印第安斑蝥提纯,体型最大,毒性最强,药性最猛,药用价值也最高。富含高活性“斑蝥素”,能与肝炎病毒粘性吸附,破坏病毒复制模板,产生抗体免疫,不仅能实现全面转阴,对肝细胞修复率也竟然达到97.5%,这是其他传统中药很难达到的效果,并且由于其独特的斑蝥、糯米、紫草组方精华,只要防治得当,患者治愈后复发率几乎为零。

全国免费咨询电话:8008807308  
咨询热线:13739300838  
销售地址:八坊顺天大药房  
买三送一 买五送二

